

田中角荣与 战后日本政治

张跃斌◎著



田中角荣与 战后日本政治

张跃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中角荣与战后日本政治/张跃斌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 - 7 - 5161 - 4224 - 0

I. ①田… II. ①张… III. ①田中角荣(1918 ~ 1993)人物研究 ②政治—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F833. 137 ②D7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8168 号

出版人 赵利英
责任编辑 崔庆玲
责任校对 张慧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为什么要研究田中角荣	1
二 理论与方法	6
三 先行研究成果	18
第一章 田中早期的政治活动——新时代的风云儿	26
第一节 田中是如何走上从政道路的	27
一 家庭和环境	27
二 个人成长历程	32
三 日本战败前后的田中角荣	40
第二节 田中早期政治活动的轨迹	50
一 竞选并当选众议员	50
二 政治地位的确立和选举地盘的巩固	56
三 人情的政治和金权政治丑闻	65
第三节 田中的议员立法活动	76
一 田中立法活动的概况	77
二 田中角荣和燃油税法的制定	83
三 议员立法活动对田中政治生活的影响	89
小结	97
第二章 自民党实力人物——黄金时代的功臣	100
第一节 自民党实力人物的轨迹	101
一 自民政调会长	102

二 大藏大臣	106
三 自民党干事长	109
四 通产大臣	116
第二节 越山会与利益诱导政治	120
一 越山会的发展演变史	122
二 越山会的主要功能及其运作原理	128
三 战后日本利益诱导政治的成因	138
四 如何看待利益诱导政治	144
第三节 田中角荣与官僚的关系研究	149
一 田中对官僚的评价	151
二 田中对官僚的控制和笼络	155
三 官僚在田中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158
第四节 田中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原因	162
一 经济环境和经济氛围对田中有利	163
二 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对田中有利	169
三 积极的准备、慎重的对应	173
小结	176
第三章 内阁总理大臣——转折时期的应对	178
第一节 总理的轨迹：先扬后抑	179
一 1972年大选失利	180
二 导入小选区制度的失败	181
三 石油危机的爆发	184
四 1974年参议院选举	186
五 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	188
第二节 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过程中的贡献	191
一 建立在意识形态偏见之上的中国认识	191
二 作为选举战略一环的中日关系问题	196
三 作为一项事业的中日关系正常化	199
第三节 《日本列岛改造论》的悲喜剧	208

一 《日本列岛改造论》的主要内容	210
二 《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实施过程	218
三 失败原因之一：计划具体而缺乏灵活性	221
四 失败原因之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	227
小结	236
第四章 “幕后将军”——逆境中的抗争	239
第一节 “幕后将军”的发展轨迹	240
一 三木、福田内阁时期	240
二 大平正芳内阁时期	242
三 铃木、中曾根内阁时期	246
第二节 洛克希德事件对田中的影响	248
一 洛克希德事件	248
二 洛克希德事件和自民党内的政治斗争	253
三 洛克希德事件中的美国因素	257
第三节 田中角荣与战后日本的金权政治	262
一 过于突出的“成功”	263
二 过于露骨的手法	267
三 过于顽固的态度	273
第四节 田中角荣和自民党的派系政治	280
一 田中派的正常发展阶段	281
二 田中派的异常发展阶段	286
三 田中派一派独大的原因	291
四 田中派的发展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298
小结	304
结语 田中角荣和战后日本政治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33

绪 论

一 为什么要研究田中角荣

对于中国人来说，田中角荣的名字是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联系在一起的。1972年，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并由此开启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纪元。在这个过程中，田中角荣居功至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田中作为中日友好的开拓者始终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中国人最熟悉、最亲近的日本政治家可能还是田中角荣。作为上述感情的一个反映，中国学界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论述了田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不过，就田中的政治生涯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仅仅占据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田中角荣这个人，作为战后日本政治家的这个人，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展现在面前。试以2006年出版的《昭和战后史》对田中的描述为例：“关于政治家田中的评价，现在依然没有定论。确实，批判他是金权政治家、撒钱政治元凶的声音很强烈。不过，从扶弱济困的观点出发，对日本列岛改造论持肯定态度的声音也很强。同时，还有一些人对他的权钱交易表示同情，认为没有学历的他一步一步爬到首相的位置，这样做也是人之常情。但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田中角荣是在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极具个性的政治家。”^① 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田中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其政治作为有着各种各样的侧面。

田中出生于大正年间，家境并不富裕。15岁高小毕业之后，就以一个

^① 古川隆久：《昭和戰後史》下，講談社2006年，第93頁。

打工者的身份走向社会。后来，他在东京半工半读，学习了建筑方面的知识。19岁，他创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开始创业。到日本战败之前，田中在建筑行业站稳了脚跟，并且积累了可观的个人财富。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田中投身政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自1947年始，田中从一名普通的国会议员，一步一步攀登到内阁总理大臣的高位，成为日本政坛的一个奇迹。在辞去首相职务之后，其政治能量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他很快就重整旗鼓，恢复了对政界的影响力。1976年，田中涉嫌在洛克希德事件中受贿，被媒体描述为“金权政治家”的典型，以至于被迫退出自民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田中的政治权力此后不仅没有式微，反而持续膨胀，逐渐变成了日本政坛的“首相制造者”。也就是说，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日本首相的人选。可是，这种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1985年，他的政治活动被病魔残酷地终止了。从田中的人生轨迹、从政轨迹来看，其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的特征，无疑蕴含了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我们去梳理其轨迹、探索其原因、发现其启示并获得一些学术和人生的感悟。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田中的政治道路和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密切相连。他1947年当选众议员，1985年因病基本丧失了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前后时间长达38年之久。在这38年期间，日本历史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战后恢复、高速增长、石油危机以及低速增长，迅速从一个百废待兴的战败国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而田中1993年的去世，又恰逢自民党长期独掌政权的终结，这种巧合也许是偶然的，但它是一种强烈的暗示：田中角荣象征着自民党。从田中起起伏伏的政治轨迹中，我们能够隐约窥见战后日本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轨迹。由此可以推断，田中的政治道路正是诠释战后——确切地说是20世纪后半期——日本政治的一把钥匙。对此，可以继续展开来分析。

近些年来，就战后日本社会的诸种特征，日本学界强调战后日本和战前日本之继承性的论点十分盛行。自然，就历史本身而言，继承性和断裂性是同时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估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田中的人生经历乃是说明日本战败前后历史继承和断裂的一个很好的材料。田中从政是在1946年，其时他27周岁。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很年轻，但是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他已经度过了其人格的形成阶段，而其世界观也基本

定型。所以，战后改商从政的田中，其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战前的旧习；其从政的基础依然是战前经商的财富积累和人脉资源。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时认识到，田中在战后遭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可以在政治上挥洒自己的辛劳和才干，而且他也可以获得认同和回报。游戏规则变了，田中就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们可以提问：战后社会为田中提供了何种可能性，而田中是如何利用了战后社会的特质而走向成功的？这样，从战后日本历史的趋势来分析个人，从个人的历史轨迹来反思历史，可以加深我们对战后日本史的理解。

言及战后日本政治，大体可以说，自民党是最重要的主导力量。一般认为，自民党政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这就是金权政治、派阀政治和政官勾结政治，它们乃是自民党政治弊端的集中体现。这些特点是如何出现、如何发展的？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难度比较大，而且难以深入。如果有一个人典型的个人，则容易找到突破口，田中角荣正是这样的人。在自民党的政治家中间，田中可以说是这三种弊端政治的集大成者。鉴于此，只有深入分析田中角荣的所作所为，我们才可能对自民党政治的弊端理解得比较透彻、比较客观、比较全面。

当然，自民党政治有自己的优点，若非如此，它就无法长期执政。概而言之，其政策方针大体反映了战后日本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在这一方面，田中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他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选民、他和其他政治家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其中，田中的个人特质、从政风格、政策偏好等，从不同的侧面对他的政治前途造成了影响。在这里，探讨田中角荣的权力来源问题显然有助于诠释自民党何以能够长期执政的问题。

就政治家而言，个人形象、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是决定其成败的主要因素。田中后来在政治上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人形象密切相关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政治风格。政治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家的标识，它界定了该政治家之所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关键之所在。大致说来，政治风格影响政策取向；政治风格影响一个政治家执行政策的方式方法；政治风格还影响公众的评判。如果稍微梳理一下战后日本政治史就会发现，在日本战后的政治家群体中，政治风格不明显的大有人在，因为他

们从众，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不过田中是个例外：在战后日本政坛，他被视为“异色”政治家，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风格。显然，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自民党、审视日本政治的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概而言之，为什么要研究田中角荣？因为田中是一部人生的教材，田中是一部战后日本政治史的教材，田中也是一部战后日本历史的教材。

从以上叙述进而推之，则研究田中角荣的学术意义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长期以来，关于田中的印象和了解集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上，而他在战后日本政治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往往被忽视。因此，本研究可以进一步充实田中角荣的形象，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作为战后日本政治家的田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学界关于田中角荣的研究不够全面的现状。

第二，在日本，关于田中角荣的评价分为两个极端，或者视之为不世出的英雄，或者视之为十恶不赦的败类。显然，过度的褒扬或憎恶都包含了过多的个人感情因素，这是评论一个比较复杂、又距离我们不远的人物容易陷入的窠臼。在这里，我们把田中角荣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放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放在特定的个人成长轨迹中进行考察和评判，试图获得在整体上把握田中角荣的一个线索，相信这样的评判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三，关于田中角荣的史料纷繁复杂、极而言之可称汗牛充栋。但是，其中传言、捕风捉影、夸大其词甚至凭空捏造的材料很多。本书从资料的搜集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着手，力求以可信的材料作为论述的根据，从而把对田中角荣的研究做成一个信史。

第四，关于战后日本政治史，可以从综合的、宏观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个别的、微观的角度研究。宏观的角度比较重视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方向，而微观的角度则比较重视政治演变的细节和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由于田中本人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本书的研究可以兼顾宏观和微观、大局和细节，从而有助于深刻理解战后日本政治的变动及其原因。

第五，田中角荣的政治风格和自民党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二者既有

共同点也有相异点。如果说，自民党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深具日本特色的政治现象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田中角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参与者，并且他以自己特有的个性和能力，把自民党的政治文化发展到极致，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政治文化扩张了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探讨田中政治风格以及其和自民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演变轨迹，发现西方政治制度和东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思考日本政治现代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同时，研究田中角荣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两点。

第一，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日本政治的走向。了解历史才能洞察未来。作为一个深刻反映了战后日本政治特征的政治人物，如果不深刻了解田中角荣及其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正确了解田中角荣之后日本的政治发展。例如，田中曾经以金权政治获取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也因为金权政治而身败名裂。田中之后，政治家的清廉与否便成为衡量其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但凡政治家受到从事金权政治的怀疑，其政治声誉就会受到严重打击。日本政坛曾经的实力人物小泽一郎是田中角荣的得意弟子，其在政治手法上受到田中很大的影响，而金权政治也是其中的一项内容。2009年日本民主党先后曝出小泽一郎的政治献金丑闻，沉重打击了其在政界的影响力。2010年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小泽一郎之所以输给菅直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小泽当时依然没有摆脱金权政治的嫌疑。再例如，田中曾经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派系，并引发了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从派系斗争的纠葛来说，所谓“角福战争”——也就是田中角荣和福田赳氏的争斗连绵不绝，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田中去世之后，其门生长期主宰日本政坛。但从21世纪开始，田中的对手——福田赳氏的弟子开始抬头，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福田康夫等人先后就任首相就是最好的证明。小泉纯一郎曾经当过福田赳氏的秘书，属于继承了福田赳氏派系衣钵的森喜朗派。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高喊的“摧毁自民党”的口号，其实质则是企图摧毁继承了田中派衣钵的桥本龙太郎派。

第二，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过，如何更加民主、科学、高效地进行政府管理，乃是摆在各国

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从田中及其时代的政治实践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经验，也可以发现许多沉痛的教训。例如，田中获取政治支持的基本模式是满足对方的各种物质利益，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而且有效，但是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上述模式难以为继，从而造成田中个人政治生命的挫折和自民党政策的混乱。显然，对于我国而言，这种简单的、短视的政治行为需要警惕。另外，田中是日本金权政治的典型。那么，田中是如何运作其金权政治的，这和日本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之间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相信这样一种研究对于我国惩治贪污腐败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田中角荣于 1993 年去世，同时自民党也于该年失去了长达 38 年之久的执政党地位，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从日本战败投降到 1993 年左右。

二 理论与方法

（一）本书主要使用和借鉴的理论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基本的指导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乃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汲取了全人类的优秀智力成果而创造性地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够攀登到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巅峰。在我们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中把握问题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具体事物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也有助于我们对具体事实进行甄别和判断。除了这些一般性的指导意义之外，对于本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人物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在开阔视野、挖掘深度上提供强劲的动力。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进行考察，这样的研究才比较科学，也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包括社会性和自然属性，但其本质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这说明，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都使人成为活生生的不同的人，都使人成为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人物不是为所欲为的，即便是首相或者总统，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行为中发现某种因果关系，发现他所在的时代、所属的集团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他的政策、他的思想都是有迹可循的，绝不是某种异想天开的产物或者灵光乍现。因此，要认识历史人物的本质，就必须把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必须深入到其所处的时代，必须深入到其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中。唯其如此，才能够对历史人物进行比较科学的阐述，才能够获得比较满意的结论。马克思曾经指出了历史研究的正反两种例子。他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② 应该说，这段话对于学者进行历史研究有着极大的警示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历史人物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 具体而言，一方面，历史人物只能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创造历史，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而恩格斯也有相似的论述：“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4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2、173页。

④ 同上书，第669页。

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①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指出，“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②。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所以，就历史人物而言，或者说英雄人物而言，他们就既不是唯心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能动的；也不是如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纯粹受动的，而是能动与受动的统一，是受动制约下的能动，是对受动条件的能动改造。他们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是受既定的、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制约的，但另一方面在此既定条件所限定的范围或可能性空间内，主体是能够“能动地表现自己”亦即能够有选择某一特定的、适合于自己目的的存在形式而通过自身的活动去使之实现的。

正是在上述理论的启发下，本研究将充分重视日本战后新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新的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探讨这种环境中的田中角荣，这才是一个有着清楚的历史坐标的历史人物。同时，本研究将探讨客观环境如何影响，或者如何限制着田中角荣的政治选择，从而表明其作为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另外，本研究也将充分重视田中角荣的个人特质、个人活动，以及这种个人特质、个人活动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战后日本的政治现实，从而能够准确、深入地分析和评估田中角荣这个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

就客观环境而言，战后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既为田中发挥个人能力提供了舞台，同时也对其形成了某种制约。田中的政治生活既是在这种新的舞台上展开的，也是在这种制约中展开的。如果在考察田中政治生活的时候，不能意识到这样一种大的背景、大的历史框架，便不能对其政治生活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就主观能动性而言，田中角荣之所以能在战后日本历史上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关键就在于他适应了战后的客观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了战后的客观环境。无论是自民党的金权政治还是派系政治，也无论是政官勾结政治还是利益诱导政治，田中都在其中加入了积极的个人元素，从而把其效用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6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1页。

因此，田中之所以能够踏上日本政坛的最高位置，在于他能够熟悉和掌握自民党政治的一些游戏规则，同时依靠自己的胆识和能力，利用了这些游戏规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和改进了这些游戏规则，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些游戏规则的最大受益者。

本书的题目《田中角荣和战后日本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中，从而相互观照并走向深入。这意味着：本书一方面试图通过研究田中角荣，深化对战后日本政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研究战后日本政治，深化对田中角荣的理解。

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鉴于战后日本政治的实际情况，本书还借鉴西方的政治文化理论，力图对战后日本的政治发展和特征作出一些分析和阐释，也有助于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作为政治家的田中角荣。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对象。其学术渊源，即关于政治文化的初步认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例如，亚里士多德描述过促成政治稳定或变革的心态，伯克提出过“习惯凝聚”会影响政治机构的运行，而托克维尔则重视政治价值观和情感的作用。不过，政治文化作为一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系统地被阐述和认识，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其中，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最具开创性意义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政治文化的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进步，政治学者对政治文化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政治研究中过分重视形式上的政治机构如政府、制度、法规等趋势的一种反动。

政治文化的定义有多种版本。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指出，政治文化的概念概括了“社会传统、制度、惯例、风俗的精神，公民的感情和集体思考以及领导的风格和运转的规则，这些都不仅仅是随意的历史经验的产物，而是互相配合的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构成一个可体会的关系网”。^①而阿尔蒙德（G. A. Almond）认为政治文化是传统、历史记忆、动机、准则、情感各要素结合的倾向。他认为，政治文化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认知，即对政治系统的认识和意识；情感，即对政治系统的感

^①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

觉和态度；评价，即对政治系统的判断。^① 日本政治学者石田雄认为：“如果‘政治文化’属于‘规定政治运动状况的各种价值’，是‘关于政治的相互作用与政治诸制度的模式的信条体系’，那么一切政治行动均以某种形式在这一‘政治文化’的框框中展开。”^② 而《广辞苑》（第四版）对政治文化的解释则是：“从各国及各集团的文化独特性来把握其政治状况。美国比较政治学用语。政治风土。政治本质。”显而易见，不同的政治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政治文化反映的是人们在政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于思想意识领域的某种规律性东西，而这当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治运作的现实，这表明，政治文化是和文字化的政治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政治文化，正如其字面意思所表现的那样，是政治中的文化，它首先反映的是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政治运行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和历史传统、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理念能够以相同的表述出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但是其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形式，这就是政治文化发生作用的结果。或者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政治文化是政治运作的软环境，它和刚性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文共同作用，规定了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发展的特点、方向和趋势。因此，如果说政治制度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的理论状态或者理想状态的话，那么，政治文化则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

当然，政治文化这样一个学术概念的适用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同的。对于英美等国家而言，其政治制度是原生的，所以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因而政治文化对政治现实的解释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政治文化的概念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时比较有效。学者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的所谓民主化浪潮中，也就是在这些国家民主化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开始注意到政治文化的重要性。通过对

^①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的话”第2页。

^② [日]石田雄：《日本的政治文化》，章秀楣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民主化浪潮的深入分析，阿尔蒙德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参与制国家的民主模式将在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中获得发展的话，这种模式的要求将超出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如普选权、政党和立法机构等等。事实上这些形式也是极权主义参与类型的一部分，如果是从形式上而不是从效能的意义上来看的话。”“民主政体复杂的基础结构——如政党、利益集团及大众传播媒介——及其对它们内部的活动方式、运行准则和社会心理前提的了解在西方还刚刚被意识到。……对于民主首先必须认识到民主是一种关于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恰恰这一点是难以认识到的。”^① 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政治制度——通常是所谓的民主制度——是移植过去的，所以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呈现出严重不对称的分裂状态。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它相对稳定而不易变化，因而几乎是不可移植的。阿尔蒙德在其关于政治文化的论述中就强调了这一点：“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即政治精英们做出决策、他们的准则与态度以及普通公民的准则与态度、普通公民与政府及其他公民的关系等方面——则是更为难以捉摸的文化成分。它们拥有更强的信仰体系的传播性能或个人关系准则的传播性能。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这些文化成分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将经历实质性的变化。”^②

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给予政治科学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其学术作用十分巨大。1966年，派伊在与维巴合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一书的绪论中指出，政治文化概念具有六项研究效用，其中包括：用政治文化概念研究国家发展，可使宏观分析法与微观分析法出现共同的焦点：政治学行为学派兴起后，政治研究的焦点转向个人的政治行为与决策行为，而忽视了政治社群还是一个动态的、集体的整体；政治文化概念为解释社会、经济因素与政治表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有用的基础；政治文化的概念有助于研究者同样重视理

① [美] 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等译，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5页。